

儒家倫理如何為“生命”的道德 辯護——以“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為例進行的考察

郭衛華

摘要

儒家倫理從“天道”的角度賦予人之生命以神聖性和超越性，而輔助生殖技術則通過技術使人之“生命”從神聖性、超越性的形上境遇被拋入到世俗境遇中，生命的“祛魅”成為這一趨勢的集中表現。並由此，引發了“生命”的形上界定和由技術展現世俗化的生命界定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儒家倫理為技術干預下的“生命”進行道德辯護的關鍵在於：儒家倫理應以一種辯證、開放的態度為輔助生殖技術展現的世俗化的生命倫理提供形而上學的精神本源基礎。

【關鍵字】 儒家倫理 生命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郭衛華，天津醫科大學醫學人文學院講師，中國天津，郵編：300070。

本文是 2011 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先秦儒家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形態研究”（項目編號：11CZX065）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外醫學哲學》X:1 (2012 年)：頁 29-40。

© Copyright 2012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所展現的生命倫理境遇，激起了人們對“生命”的道德反思或道德辯護，它既是技術革命，同時也是引發人們倫理觀念變革的哲學革命。“輔助生殖技術”特別是生殖性克隆技術直接打破了傳統倫理宣導的以夫婦為“原點”的生命延續方式，以血緣關係作為家庭和社會的連結紐帶在其間變得不再至關重要，而這一點正擊中了儒家倫理的要害。儒家倫理的基本特質是從血緣關係出發構建自身的“倫理世界”，一旦血緣關係被抽離出來，其所構建的“倫理世界”就會坍塌，而以“倫理世界”為“座架”的“道德世界”也會變得空疏。顯然，儒家倫理無論是在時代背景上，還是在問題視閥以及研究進路上，與當代生命倫理學都顯得“格格不入”。因此，面對“輔助生殖技術”引發的倫理詰難，在當代進行儒家生命倫理學研究似乎只是一種懷舊式的情感回應。那麼，儒家倫理與當代生命倫理學只能“天各一方”嗎？本文試從“生命”的道德本質出發，為儒學與當代生命倫理尋求會通的機緣與意義。

一、 儒家視中的“生命倫理”

哲學起源於人的自我反省或自我認識，它要探討事物是其所是的根本。根本的唯一的真實存在就是人之“生命”。儒家道德哲學也正是從“生命”之“是”出發來理解生命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從而理解時間、空間、歷史、過去、現在、未來，理解人類實踐活動的本質、價值和意義，理解有限的人類生命如何開創無限的生命之永恆。所以，在儒家道德哲學中，“生命”特別是人的“生命”不只是自然性的客觀存在物，同時也是超越於客觀實在之上的價值存在和意義存在，並且前者是後者的出發點。

第一，“生命”之本體。生命的規定是由“生命”之所“是”而來，這既是一種哲學追問，也是道德追問的本體基礎。那麼，在儒家道德哲學中，何為生命之所“是”呢？《易·繫辭傳》雲：“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個“生”字涵括了儒家生命之所“是”的問題。“生”的本義是“生氣”、“生意”、“生活”、“生動”、“生

長”、“生成”、“生育”、“生髮”。儒家道德哲學在承接“生”的原始本意的基礎上，又對“生”進行了哲學的提升。“生”首先是天地的本性，“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繫辭上》，“生生之謂易”（《易·繫辭上》）。在宇宙洪流中，“生”是一個具有神性魔力的活動，而這種神性魔力就源於“生”中所展現的“生命力”，它是造就生命、化生宇宙的最原初動力。有了生命力，生命就會壯大成長，“天地姻媾，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繫辭下》）；“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易·繫辭上》）在“生”的這種化育流行中，生命、自然、人和世界具有了同一性的根基。這樣，儒家以“生”作為生命之所“是”，向我們展現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化育流行的生命境遇，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這一個‘生’字是最重要的觀念，知道這個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話。孔家沒有別的，就是要順著自然道理，頂活潑頂流暢的去生發。他以為宇宙總是向前生發的，萬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與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滿了生意春氣。”¹ 儒家這種從宇宙大化流行的生命之流中尋求生命之所“是”，生命的本體地位隨之得以確立。

第二，“生命”之價值。緊隨生命之所“是”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生命之價值，這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的關涉到倫理實踐的問題。儒家以“生”作為生命之所“是”，並由此出發從三個層面探討生命的價值和意義：(1) “天地萬物一體為仁”，這是儒家對生命價值的總體判斷。儒家倫理站在宇宙的高度把生命的化育流行作為天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並把順應這種天道最為德性的總綱。因此，儒家把愛護一切生命作為最高的德性，從孔子提出的“弋不射宿，鈞而不網”到宋明理學家程顥提出“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來對待萬物的理念，展現了儒家敬畏生命的終極價值追求。從生命的“大同”看，一切“生命”都是“天道”的展現，但是一旦進入真實的、感性的、具體的生命存在，關注植物的生命、動物的生命、人的生

(1)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126-127。

命等等，就必然從分殊的異質個體與其整體的關聯處進入異彩紛呈的生命情境。由此，儒家對生命價值判斷進入第二個層面。(2)“唯天為大，唯人為靈”。在儒家看來，雖然所有生命都是宇宙化育流行的結果，但是在所有生命中，只有人的生命是唯一具有靈性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的靈性不僅是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而且也是人從宇宙生命洪流中凸現出來的根據。由此，人是最高的生命存在。因為“最高”，所以人不能像動物那樣，把生命的價值只停留於生物性欲望滿足中，還應該追求更高的生命價值。基於此，儒家對生命的價值判斷又進入第三個層面。(3)“與天地合其德”。在儒家的“生命”視域中，“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道”的本質為“生道”。而人作為天道化育流行的最高生命存在以及由此生發的主體性存在，持守“天地生物之心”而進行實踐活動便是“人道”。因此，從生命倫理的角度看，“人道”的本質便是順應天之“生道”。具體而言，人之生命的價值，除了以主體性的姿態仁愛萬物的同時，也要秉持“生生之道”，以德性的生命引領生物性的生命，努力追求自身生命的飽滿。

第三，“生命”之永恆。儒家生命倫理不僅從天道的角度確立起生命的本體地位和生命的神聖性，而且還站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洪流中，通過生命之超越實現生命之永恆。從自然的角度看，生命有春華秋實，潮起潮落，有生亦有死，有對生命永恆之嚮往，亦有大夢初醒之幻滅。然而，從人之生命的精神性存在看，人又有對生命之永恆的追求，並把這種對永恆性的追求付諸到人類實踐活動中。如何實現生命的永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其實現方式則根本不同，如在宗教文化背景下，人之生命永恆性的實現在於“彼岸世界”，而儒家文化作為一種入世型的文化，把人之生命永恆性的實現就放諸於“此岸世界”。那麼，在“此岸世界”中如何實現生命的永恆呢？在儒家看來，社會精英人物可以通過“立德、立言、立功”實現生命的“不朽”，而對於普通大眾來說，則是在“家族”的綿延不息中實現生命的永恆。儒家的此種倫理思維方式不僅是個

體生命在“家族”綿延中獲得生命的永恆與無限，而且也展現了人之“類生命”的本性，“人類生命同屬於整個大地生命，而每一個人類的個體生命都屬於整個人類生命。每一個個體生命都是整個人類生命和大地生命發展的極致，而大地生命只有到了人的生命這裡才表現為一種‘類生命’，才表現為一種自由生命。”² 這樣，人之生命不是漂泊無依的原子式的個體，而是通過向“家庭”和“國家”這兩大倫理實體的回歸展現自身“類生命”的本性。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生命倫理對人之生命的“類本性”的界定是建立在人的生物性基礎之上的，即儒家以生物性的血緣關係作為人倫關係的基礎，個體生命倫理身份的確認則以血緣和婚姻為基點。從此種意義上說，基於自然的血緣關係在儒家生命倫理中具有絕對的地位。

二、“輔助生殖技術”的道德隱憂：“生命”的法魅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產生和在臨床醫學中的應用，既是前所未有的技術革命，同時也是引發人們倫理觀念變革的哲學革命。如果我們對這一技術革命進行深入思考，就會透過它在技術上的變革，觸及它在倫理思維方式上產生的深遠影響；亦即，它對儒家傳統道德哲學的基於自然的天道觀以及由這種天道觀所界定的人之生命的神聖性、主體性以及人之倫理實體性的根基提出了挑戰，在某種程度上對儒家倫理產生了顛覆性的後果。這一後果就是，“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把生命從神聖性、道德性的精神境遇中拋回到生物性的自然境遇中，並展現出一種俗世的生命倫理境遇，並由此引發一系列道德隱憂。

第一，生命的神聖性遭劫。生命的神聖性是人類對生命最基本的價值判斷：從外在價值看，人類生命是“天”或造物主賦予的禮物，“唯天為大，唯人為靈”；從內在價值看，每個人的生命都具有無法代替的獨立性和不可褻瀆的尊嚴。但是無論從外在價值還是內

(2) 田海平：〈生命倫理如何為後人類時代的道德辯護——以“人類基因干預技術”的倫理為例進行的討論〉，《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4期，頁24。

在價值肯定的生命神聖性都起始於對人類生物學生命本身魅力和豐富性的認可。然而，輔助生殖技術自然生命的深度干預使其遠非僅為技術問題。人類發展和輔助生殖技術不僅只是實現幫助夫妻得到孩子的簡單願景，它還有更深遠的目的，即通過操縱基因、操縱精子和卵子、操縱受精卵、操縱胚胎和胎兒、甚至是操縱人體的方式扮演“上帝”的角色，“創造”出符合此代人的利益和目的的“生命”，如美國“加利福尼亞低溫銀行”推出的“定制寶寶”的服務，“你希望自己的孩子長得像貝克漢姆嗎？”“可以是眼睛、鼻子、嘴巴或任何外表特徵的形狀，也可以是頭型、膚色，甚至可以是髮型，因為你描述的是某人的樣子（包括髮型）。這就是我們試圖提供的東西。”³“加利福尼亞低溫銀行”宣稱這種“選擇性生育”就像在超市選購一個完美的孩子。輔助生殖技術的此般應用已經以一種超越生命道德底線的方式表達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隱憂：即輔助生殖技術對人類文明以及對人之生命的控制，可能會出現一種我們不願意看到的後果：人類生命的神聖性遭到前所未有的祛魅，隨之而來的就是人類以往對生命神聖性的認可被顛覆，個體生命無可替代的尊嚴性和獨一無二的特徵也將會被破壞。這是人類難以接受的“道德事實”。但是，輔助生殖技術在臨床醫學中實際應用，已經展露出人的肉身存在被資源化、原料化、物質化的趨勢，它使人變成了人力物質，被運用於預先安排好的目的。因為“技術並不只是物質現象，而且也是精神現象。它不是外在於文化的，它本身也正是社會發展中文化作用的要素。技術是人的精神活動的世界。它不像自然那樣是‘自己’形成的。技術所包含的知識不是由外在世界引起的，而是由人發現、揣摩、‘構想’出來的。”⁴於是，輔助生殖技術創造的生命世界中，隱匿著生命的神聖性遭遇褻瀆的道德焦慮。

(3) Pennyhuang：《美國新興人工受孕服務，宣稱可定制明星臉寶寶》：<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48152804.html> (2009年11月7日)。

(4)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毛怡紅譯：《後現代文化——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後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頁2。

第二，生命主體性的失落。人之生命作為有意識的自覺的生命形態，是一種主體性的存在，它時時刻刻都會意識到自己的主體性，並以主體的姿態來看待和處理“我”與客觀世界的關係，並力圖實現主體性的自由。儒家道德哲學也正是立足於此，把人之生命置於所有生命的最高地位。這也是人之生命尊嚴得以確立的根基。正如楊國榮教授所言：“要求個體的自我完善，強調個體的道德自覺，注意確立崇高的道德理想與道德境界，是儒家的價值目標之一，它追求的不是非人格的功利結果，也不是無選擇的沉淪於世俗及大眾之中，而是自我在世界中的卓然挺立，儒家的這種主體原則既避免了人的物化（包括商品化），也超越了片面的大眾意識，它對主體性的重新確認，似乎可以提供某種文化心理方面的啟動力。”⁵ 輔助生殖技術的產生極其廣泛的應用前景展現了人類以主體性的姿態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重大進步，在這種進步中，人類在優生優育、改善生命品質等方面獲得巨大利益。輔助生殖技術取得的輝煌成就為提高人類的生命品質和生存能力帶來了令人振奮的希望，人的生命的自由本性獲得了質的飛躍。然而，在現實世界中，輔助生殖技術被置入政治意識和技術意志的現實運作中，它卻把人類拋入到“善惡”逆轉的悲劇命運中：即人類在享受自身“創造”生命的主體性自由的同時，又陷入到技術可能演變成為遏制或扼殺人之生命的主體性自由的“夢魘”中。因為，人類在以主體的姿態開發和應用輔助生殖技術的同時乃是以其對技術的依賴為前提的，“現代技術在我們時代的專橫統治，使所有存在者，不僅僅是人，也包括自然和歷史，都處於某種要求之下。”⁶ 在輔助生殖技術創造“生命”的技術輝煌中，深藏著“主體”的危機。如基因生殖技術使人的自然體在相當程度上為技術所支配，使人類由上帝的“追隨者”的角色轉變成為“充當上帝”的角色，即試圖經由技術的力量而成為新的造物主。但是

(5) 楊國榮：《善的歷程——儒家價值體系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27。

(6) 田海平：〈關注現代生命技術展現的生命倫理意蘊〉，《道德與文明》，2008年，第1期，頁84。

人畢竟是有限的、具有主觀任意性的存在，人類雖然可以利用技術的力量“製造”生命，但是並不能成為無限的生命存在。人可以體會“天道”，但是不可能成為“天道”。因此，輔助生殖技術使我們陷入到一種悖論中：技術是人類生命主體性的一種擴展，但是這種擴展最後卻擴展到我們自身，使我們自身也成為人化自然的一部分。而且這種擴展的直接道德後果就是：生命被“技術”異化，人之生命主體性也隨之失落。

第三，生命的碎片化存在。在儒家的倫理思維中，婚姻與血緣是締結家庭和家族延續的基礎，也是個體生命獲得倫理實體性的自然基礎。然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特別是供精人工受精和克隆性生殖技術直接顛覆了儒家以血緣關係為基本人倫關係構建的“倫理世界”，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婚姻與生育的分離、血緣關係在家族延續中的地位的淡化。湯瑪斯·A·香農在《生命倫理學導論》中提出，“由於我們使用新技術能力，如今的父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要重新認定。對於婦女來說，有其中可能的母親身份：1. 提供卵子的基因母親；2. 懷孕的生育母親；3. 養育孩子的養育母親；4. 提供卵子、懷孕，但並不養育的基因——生育母親；5. 提供卵子、養育，但並沒有生育的基因——養育母親；6. 提供卵子、懷孕和養育孩子的完整母親。對於男性來說，只能得到三種父親身份：1. 精子來源的基因父親；2. 養育孩子的養育父親；3. 提供精子和養育孩子的完整父親。”⁷ 生命科學技術對人類生命的深入干預使得人與人之間基於“自然”的倫理關係變得複雜化了，特別是精子和卵子被商品化或代孕母親的出現，使人的自然倫理身份的確認更為複雜，甚至使人類面臨著自然血緣家庭遭遇解體的危險。這些干預帶來了如何確立新的倫理關係的爭論，因為“無論是人是家庭的‘自然’，對既有的道德與倫理來說，都具有絕對的價值和意義。……家庭一旦徹底解體，現有意義上的倫理便‘喪失’，因為無論是人最初的實體

(7) 湯瑪斯·A·香農，肖 巍譯：《生命倫理學導論》（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 57-58。

性，還是神聖性、義務感的淵源由此喪失。”⁸ 家庭是一切道德哲學體系的基石，輔助生殖技術對這一基石的動搖，直接使人之生命陷入到“父不父、子不子”的人倫混亂狀態。人之生命的類本性也隨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顛覆。隨之，生命個體遊離於倫理實體之外，一如“幽靈”飄蕩於俗世世界中而尋求不到生命的本真存在和超越“自我”本能衝動與主觀任意性的倫理整體性，乃至於成為“碎片化”的生命存在。

三、 儒家倫理：如何在“輔助”中“守護” “生命”道德

從儒家對生命形而上學的解讀和輔助生殖技術引發的道德隱憂來看，我們可以斷言，輔助生殖技術關聯著我們對生命的重新理解，如經過人工干預的生命就不具有了神聖性嗎？家庭的構成一定以血緣和婚姻為紐帶嗎？婚姻和生育必須是一體的嗎？自然出生的人與通過輔助生殖技術改造、強化的人以及通過克隆生殖技術產生出來的人是否應該具有同樣的道德地位？面對著生殖技術引發的這一系列道德難題，今天的我們確實感受到了雅斯貝爾斯 50 多年前所說的那種情形：這是一個人們愈來愈需要引領的世界。那麼，產生於輔助生殖技術之前的儒家倫理能夠擔當起“引領人”的角色嗎？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以一種辯證、開放的思維把儒家形而上學的生命倫理學和輔助生殖技術展現的世俗的生命倫理境遇會通起來。

一方面，輔助生殖技術展現的俗世的生命倫理境遇，為儒家形而上學的生命倫理走向現實生活架起了一座橋樑。從我們對儒家關於“生命”界定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學語境下的“生命”概念與現代生命倫理學特別是生命科學技術中的“生命”概念有著根本不同。在儒家的生命理念中，生命並非一個單純的概念，而是表現為一個哲學

(8) 樊 浩：〈基因技術的道德哲學革命〉，《中國社會科學》，2006 年，第 1 期，頁 123。

倫理學的形而上的概念系統；從“天道”即為“生道”出發，勾畫出了一個以“生”為綱而言“命”、“性”、“天”、“道”的宇宙生成圖示。儒家對生命的此般界定，使儒家生命倫理具有了獨特的意蘊：即從宇宙生成、世界本體以及人之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言說個體生命的意向性和規定性，展現出重視生命、以道德生命引領生物性生命的價值取向。儒家如此言說生命之規定，一方面為我們探究人之生命本性提供了形而上學的哲學根據，面對現代生命科學技術引發諸多現實層面的道德難題，儒家從形而上層面探討的生命倫理似乎難以為當代生命科學技術引發的生命倫理問題提供直接的價值資源，這也許是儒家生命倫理被當代生命倫理質疑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們還應該意識到，儒家倫理還有另外的本性，即開放精神和入世精神，儒家倫理的這兩大精神為其應對輔助生殖技術引發的道德難題提供了內在的精神基礎。從此種角度上說，輔助生殖技術雖然對重視自然血緣關係的儒家倫理造成了“致命性”的打擊，但是另一方面，又為具有開放精神和入世精神的儒家倫理走向現實生活、從形而上的生命本體問題走向具有現實性的生命倫理問題提供了契機。

另一方面，儒家形而上學的生命倫理學為輔助生殖技術展現的世俗化的生命倫理學提供形而上學的根基。如前所述，輔助生殖技術的產生和臨床應用對人生命的深度干預使人類跌落於“善惡”逆轉的悲劇命運中：從“善”的角度說，輔助生殖技術為人類克服遺傳疾病、實現優生優育願望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對於注重傳宗接代的儒家倫理來說，夫精人工授精技術從技術層面解決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道德難題，而從注重血緣關係的儒家來說，夫精人工授精技術進一步強化了血緣關係在構建家庭中的重要意義；從“惡”的角度說，輔助生殖技術的臨床應用直接挑戰和顛覆了現有的倫理體系和道德模式，特別是輔助生殖技術中供體人工授精和生殖性克隆無論是對人之自然生命本身，還是對於人之社會生命和精神生命，都有可能給人類造成毀滅性打擊。面對輔助生殖

技術對人類的如此影響，對輔助生殖技術的倫理思考在哲學層面上的挑戰就在於：輔助生殖技術對人之生命的深度干預，使人類陷入難題；這些難題，迫使我們思考，我們應該賦予生命以怎樣的道德規定和道德地位。在此維度，輔助生殖技術的出現及其臨床應用，所展示的問題域，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或者技術革命的問題，其在深層上是哲學或倫理的變革。這雖然是一個很具體的技術倫理問題，但它根本上是對整個傳統、整個文化的追問，甚至是對整個文明的反省和思考。因此，在我們思考輔助生殖技術引發的道德難題時，必須上升到本體的高度，對其進行刨根究底式的根源探尋，為其如此，我們才能走出對生命倫理學浮光掠影式的技術描述，進而觸及到輔助生殖技術對人之生命乃至宇宙生命帶來的根源上的改變。而儒家從宇宙哲學的高度對生命的倫理探討正契合了當代生命倫理學缺乏形而上學支撐的需要。

參考文獻

- 田海平：〈生命倫理如何為後人類時代的道德辯護——以“人類基因幹預技術”的倫理為例進行的討論〉，《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4期。
- 田海平：〈關注現代生命技術展現的生命倫理意蘊〉，《道德與文明》，2008年，第1期。
-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毛怡紅譯：《後現代文化——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後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湯瑪斯·A·香農，肖 巍譯：《生命倫理學導論》，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楊國榮：《善的歷程——儒家價值體系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樊 浩：〈基因技術的道德哲學革命〉，《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 Pennyhuang：《美國新興人工受孕服務，宣稱可定制明星臉寶寶》：<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48152804.html> (2009年11月7日)。